

八十年代的美国

〔美〕彼·杜伊格南 阿·拉布什卡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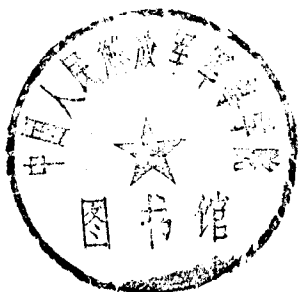
世界知识出版社



八十年代的美国

[美]彼·杜依格南 阿·拉布什卡编

程镇球 刘丽媛 马德林 等译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Editors: Peter Duignan, Alvin Rabushka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80S
Hoover Institu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1980 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 孙 政

八十年代的美国

[美]彼·杜依格南 阿·拉布什卡编

程镇球等译校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4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6.25 字数: 386,000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198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书号: 3003·1627 定价: 1.70 元

译者的话

《八十年代的美国》一书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问题研究所编辑和出版的，撰稿人也多系该所研究人员。据美国报刊介绍，胡佛研究所是里根总统的重要思想库之一，通常代表美国保守派的意见。此书便是以这一派的观点分析美国的国内外形势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从了解美国各派观点来说，此书有参考价值。

书中有些论述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仍照原文译出。有关中国的某些论点显然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违背中美建交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看法，请读者注意。

原书分国内和国际两大部分，中译本只译了国际部分，文字累赘之处略有删节，谨此说明。

目 录

前 言	格伦·坎贝尔 (1)
作者介绍	(5)
导 言	彼得·杜依格南 阿尔文·拉布什卡 (9)
一、军备控制和国防	弗雷德·查尔斯·伊克尔 (22)
二、苏联对全球核冲突的态度	阿莫雷塔·M·霍伯 小约瑟夫·D·道格拉斯 (51)
三、美国对外情报工作的前景	雷·斯·克莱因 (77)
四、技术:力量的不均衡	爱德华·特勒 (104)
五、世界能源	亨德里克·S·霍撒克 (149)
六、外援与第三世界	P·T·鲍尔 (176)
七、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G·M·迈耶 (205)
八、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政治和经济的联系	吴元黎 (235)
九、国际商业	理查德·惠伦 (263)
十、亚 洲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 (287)
十一、西 欧	艾尔弗雷德·格罗赛 (339)
十二、苏 联	理查德·F·斯塔尔 (370)
十三、中 东	彼得·杜依格南 L·H·甘恩 (395)
十四、拉丁美洲	马克·福尔考夫 (441)
十五、非 洲	L·H·甘恩 彼得·杜依格南 (475)

前 言

从朝鲜战争结束到美国深深卷入越南冲突之前这一时期，美国到处是一片乐观主义。在六十年代，普遍的看法是美国人一定会在国内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通过国家的作用、大规模公共开支和提高税收，贫困和种族主义不久即会消失。这些信念同样也体现在对外活动方面。帮助建设国家、大规模投资、发展教育以及对外援助，都是为了使发展中国家迅速地现代化和民主化。

现在，在八十年代开始的时候，乐观主义已销声匿迹。人们已认识到可以而且应当采取这些积极的步骤，但是为实现这些变化所能使用的手段毕竟是有限的。今天，六十年代在公共政策上流行着的看法已彻底改变了，现在得到广泛支持的政策是：控制政府干预、减税、限制政府机构的规模和公共事业活动的范围。公民们一般都谋求自己能多做一些，希望政府少做一些，但效率要高一些。美国认识到自己在国外履行责任的能力是有限的。单单外援并不能医治贫困，也不可能很快实现现代化。同时，美国也认识到民主并不能向其他国家输出。自越南战争以来，已经证明美国对世界事务发挥建设性影响的能力显然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共处与缓和并未能制约苏联的扩张主义，美国也没有在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多的朋友。十分明显，为了在八十年代认真对付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必须增加国防开支。联盟必须重新予以肯定和加强。必须承认，建设性的变革可能要逐步实现，与此相反，战争和革命性剧变的后果则是消极的，并常常是灾难性的。同样明显的是，有相当多的人支持那种伟大社会的构想，但由

于它所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有时是消极的结果，人们的幻想破灭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新现实主义和新的清醒感，它主张美国重新承担起保卫自由社会的责任，生活在这一社会里的个人享有自由和自尊。在进入八十年代的时候，美国人必需应付的问题有：高税收、日益增多的政府干预、通货膨胀、燃料缺乏，以及存在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中的大量的官僚主义。在国外，有许多人认为美国的所作所为已失掉了一个大国的形象，也失掉了运用力量和施加影响的手段。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发生了若干突出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倍多；联邦预算已超出了一年5,000亿美元；数百个新的政府计划已付诸实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急剧增加；几乎全部石油消费的一半是依赖外国；税收已增加到约占个人收入的40%；在1969年，联邦预算的48%用于国防开支，30%用于卫生、教育和收入保险，而在1977年，这些百分比数正好颠倒了过来。1978年，联邦政府为十二项最大的收入保险计划花费了1,900亿美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收入再分配。

在未来的几年中，美国将在国内外面临困难的选择。在国内，政府对企业过多的干预正降低着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由于数百亿美元的联邦预算赤字，造成通货膨胀加剧，正损害着个人储蓄和投资。高税收鼓励了限制州政府征税和开支的运动，选民们已开始就政府日益增长的开支发出呼声。政府对大学越来越多的干涉威胁着高等教育的自由和质量。节节上涨的费用危及到所有美国人就医的机会。能源的供应和价格成了每个人最担心的问题。社会保险制度能否存在下去已成为一个经常的疑问。而且我们的福利、卫生、住房以及刑事审判制度也都需要大加改善。

在对外事务方面，看来缺乏一种前后一致和具有连贯性的战略。对于苏联对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侵略和现在威胁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西欧的苏联战略力量和核武器需要采取对抗措施。

许多人看到，从中东到非洲这一弧形地带里所发生的危机，由于国会限制外交活动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而加剧了。美国已不再是世界上居统治地位的军事强国了。很多外国人认为美国的对外行动是捉摸不定和犹豫不决的。

美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的情况下进入了八十年代。但是也很清楚，信心可以恢复，国会中的团结一致能够而且必须重建，重新恢复目的感也能实现，而且为有效地解决美国面临的国内外问题所需要的民族意志也确实存在的。

本书由三十二名专家应邀撰文，论述美国八十年代在国内和国外政策方面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本书的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当前和最近未来的形势，然后集中于八十年代下余时间里的问题。作者们就一些最核心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可供美国选择的政策，并提供了为解决或缓和美国对面临的问题所应该采取的具体行动方针。他们的研究为美国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事务，为恢复美国决心作自由世界领袖的信心，提供了一份综合性的意见书。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长

格伦·坎贝尔

作者介绍

P·T·鲍尔是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英国科学院研究员和剑桥冈维尔及凯厄斯学院研究员。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生。他最新的著作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对发展的不同意见》。

雷·S·克莱因是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世界力量研究执行主任。他以前是中央情报局情报部副主任和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司司长。他最近的著作是《1977年世界力量估计：战略趋向的算法》，由科罗拉多州波尔德市“西方观点”印刷所与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合出版。

彼得·杜依格南是胡佛研究所非洲和中东研究室主任，利利克博物馆馆长和高级研究员。他是关于非洲历史的二十多本书的作者或编辑，其中他与L·H·甘恩共同编辑了一套名为《殖民主义在非洲》的五卷本著作，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他最近的著作是与L·H·甘恩合著的《南非：战争、革命、还是和平？》（胡佛研究所出版）。他曾获得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L·H·甘恩是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曾就非洲历史、游击战争和当代世界问题写过不少书。他毕业于巴利奥尔学院并获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最近的著作是与彼得·杜依格南合写的一本关于欧洲统治者在非洲的三部曲，由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发行。

马克·福尔考夫是俄勒冈大学历史副教授。他与罗纳德·H·达克拉特共同编辑了《庇隆的序曲：萧条与战争中的阿根廷，1930—1943》，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是胡佛研究所

1979—1980 年的国家研究员。

艾尔弗雷德·格罗赛是政治研究院教授，巴黎政治科学国家基金会会长。他出版了不少关于德国和法国的著作和论文。他最近写的《西方联盟》是一本研究自 1945 年以来的西欧和美国的著作。美国译本将于 1980 年初发行（西伯利出版社）。

阿莫雷塔·M·霍伯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和体系计划公司高级研究人员。小约瑟夫·D·道格拉斯是体系计划公司政策与战略分析部主任。他曾获得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苏联战区的核攻势》一书的作者。道格拉斯和霍伯是《苏联的核战略》一书的共同作者，该书由胡佛研究所出版社出版。

亨德里克·S·霍瑟卡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在经济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论文。他曾获得阿姆斯特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弗雷德·查尔斯·伊克尔曾担任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四年并担任过两届总统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顾问。他曾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一度是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教授和兰德公司社会科学部主任。

G·M·迈耶是斯坦福大学商业研究院国际经济教授。他曾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一直是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写过许多关于国际经济和经济发展的书，其中之一是 1976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三版的《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是罗布森研究讲座政治学教授，《亚洲概览》编辑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最近的著作是《亚洲及其前途》，他曾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理查德·F·斯塔尔是国际问题研究计划主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的编辑。他最近的著作

《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正出第三次修订版。他曾获得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爱德华·特勒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弗米奖金获得者。他是总统的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和国防情报局委员会的前委员。现为艺术与科学学会和国家科学院的成员。他曾获得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理查德·惠伦是一个国际商业顾问机构世界情报资料公司的董事长，他是《创业的父辈》、《挽回颓势》和《选择》的作者。惠伦先生在政治和商业方面具有广泛的经验。他是皇后学院的毕业生。

吴元黎是旧金山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以前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曾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现为胡佛研究所顾问。他最近的著作是《日本在寻找石油》，由胡佛研究所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



导 言

彼得·杜依格南 阿尔文·拉布什卡

八十年代在与外国的交往中，我们同样需要了解并接受美国力量有限这一事实。自越南战争以来，我们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已经减弱。我们已失去了对苏联的军事优势。我们已经懂得单靠外援不能医治贫困，现代化不能很快实现，民主也不能输出。

在八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继续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和如何满足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期望，这些国家看来将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出现动荡。

斯坦利·霍夫曼在《外交季刊》（1979）特刊中提出，美国必须注意苏联政策中的三个主要部分：战略核武器的加强；苏联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的常规力量的数量和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干涉。苏联制订政策的人们已一再宣布，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或缓和只是加强阶级斗争的手段。苏联的意图明白无误，只有那些天真的美国人才从“不同社会制度融合论”或者缓和的角度来对之加以解释。自1974年开始，苏联在非洲的扩张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使用常规军事力量——主要是古巴的力量——以达到它散布革命教义的目的。西方迄今未作出强有力的或持续不断的反应。由于未能阻止苏联—古巴对安哥拉的干涉，这就鼓励了苏联在其他地方，例如在埃塞俄比亚、也门和阿富汗进行干涉。面对苏联的威胁，北约组织已同意增加军事开支，卡特总统似乎打算重建美国的军事

实力，但这样做几乎已为时太晚。我们无视我们的武装力量日趋削弱，现在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遗憾的是，近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缺乏前后一贯的连续性和战略意识。在 B-1 轰炸机、中子弹、巡航导弹以及 MX 导弹等问题上都显示出政府的犹豫不决。政府支持像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这样一些激进的国家，却不支持像摩洛哥这样的温和国家。

但是八十年代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对苏联的意图和战略作出估计。本书的作者们看到，苏联在为核战争或政治讹诈作准备的同时，还有一项庞大的计划。在越南战争时期，国会总统最高权威的过份反应使总统难以对国外施加影响。显然，有事必须与国会磋商，然而，必须让总统——而不是国会或特殊利益集团——去处理外交事务。不幸的是，现在我们缺乏可用的力量去对八十年代的问题作出反应。国防部的专家在 1979 年 5 月承认，假如苏联或是哪个激进国家接管了比如波斯湾或是沙特阿拉伯，我们现在不可能很快作出反应。一支可以飞往任何出事地点去的十一万人的配有重装备的机动部队现在才刚刚着手建立。

我们必须向苏联清楚地表明我们决心要保卫我们自己、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盟国。我们应当告诉苏联人我们不会容忍切断来自波斯湾或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供应，我们不会允许他们或他们的代理人割断我们与非洲矿产供应地之间或我们与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战略要地之间的通道。

必须作出巨大努力以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苏联的扩张主义是受意识形态和显示活力和力量的需要所驱使的。虽然苏联不能向它的人民提供高水平的物质福利，但却能向全世界扩展它的力量和影响。军事力量和侵略性军事优势似乎是为了向苏联人表明共产主义将支配未来。美国在八十年代早期的政策将决定谁会赢得这场意识形态和军事的斗争。我们拥有经济上的优势和巨大的

技术资源，如果我们能控制住现在和将来出现的危险，我们就有可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并生存下来。

为了保证美国的生存，需要恢复自信和自我约束，特别是在现在与苏联的军事力量对比继续处于不利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伊克尔指出，美国在各个领域里的军事力量都受到了削弱，特别是在核武器方面。即或我们现在就开始一个迅速重新武装的运动，美苏之间已经扩大的核差距也将在八十年代继续扩大。十五年来，苏联用于军事研究和发展的费用等于美国的两倍，用于战略核武器的费用等于美国的三倍。卡特政府建议的1980年度增加的国防开支远远不足以弥合差距，而只能跟得上通货膨胀。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常规武器方面的劣势，使它不可能去保卫中东，从而使关键性的一翼暴露在敌手面前。核威慑不足以弥补我们在常规武器方面的弱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我们能迫使俄国人后退，但现在我们是从与苏联相比处于核劣势的地位来进行对阵。不可能在西欧使用战术核武器而不招致苏联导弹的毁灭性报复。西欧各国政府因受苏联宣传及本国公众的压力和政治间谍以及怠工者的威胁，可能只要一次核打击就会垮台，这是可以想象的事。

再者，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理论至今尚未作出调整以适应美国已经丧失军事优势的情况。除了改善我们的常规作战潜力以外，我们还必须增强报复能力以反击针对美国的全面核攻击。我们还必须更加有效地控制美国向共产党人的技术转让。

我们制止针对我们和我们盟国的武装侵略或核讹诈的能力正在受到削弱，并且正在朝八十年代军事上更大的劣势发展。苏联人相信他们能够打一场他们可以生存下来并能取胜的核战争。美国的战略思想是假设我们的常规力量能够制止苏联的进攻，如果这一着无效，我们就进而毁灭苏联。因此，美国的计划制订者们认

为一场核战争是荒谬的和不大可能的。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错误地认为苏联也是这样想的。然而苏联在他们的军事学说中宣称他们能打赢一场核战争。他们的学说和计划的设计是要能在第一次打击后生存下来并备有足够的导弹迫使美国投降。我们的打击力量是有限的；而苏联却有第二次和第三次打击力量。我们不能只用计算发射井的办法来估量苏联导弹的力量。在他们的军事著作中，公开谈论储存在军火库和贮藏所里的导弹可以从发射井以外的地方发射，而美国制订政策的人们却忽视了这一事实。

美国不能还认为在技术上仍胜过苏联。更重要的是，苏联用于研究、发展技术和武器的费用都超过了我们。趋向是清楚的，苏联人将在所有领域里超过我们。在像反卫星技术这样重要的领域里他们已大大领先。苏联的领先威胁着我们整个的情报和通讯网。他们在侦察、保密、指挥的灵活性、突袭、破坏和散布假情报方面也都超过我们。

美国必须重新制订战略方针和改组它的战斗力量以保证能保存战斗力和打一场持久战的能力。我们必须准备既能打一场长期的也能打一场短期的战争。我们收集外国情报的能力必须改进。卡特政府的改革瘫痪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现在这个局受四十个委员会的监督。

中央情报局的士气已经消沉，人员大量辞职和大量被解雇已严重削弱了这个机构的工作，拨款也减少了，因而要弄到国外情报已变得十分困难。但美国需要一个有效的情报机关。仅苏联自己就雇佣了五十万情报人员，此外，还有其他共产党国家特务网的支援。我们必须有为自卫所需要的情报。

现代战争日益为技术所支配，在这方面美国也面临对苏联失去领先地位的危险。由于我们未能利用自己技术上的优势，致使苏联人在火箭、核潜艇和反卫星技术方面已处于领先地位。我们